

一部研究中共农会组织史的厚重之作

——评《中国现代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治》

孙贵林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湖南 湘潭 411105)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5-0140-05

农会作为超越传统宗族关系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自晚清以降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些年来学界已打破过去曾长期对此专题研究不甚瞩目的局面,有关成果相继涌现。李永芳教授可谓这一领域研究的领军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在该领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先后在《中国农史》、《清史研究》、《史学月刊》、《读书》以及上海《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农会方面的高质量论文。其在2008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60万字的专著《近代中国农会研究》,曾被学界誉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的专著。”^①而近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著《中国现代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治》(2016年3月),系李教授所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与基层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研究”(11BDJ007)的最终成果。该书首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与基层社会权力结构变迁进行了系统性的历史考察,不仅在历史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加强乡村政治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是一部研究中国共产党农会组织史的厚重之作。

一、内容简介

《中国现代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治》一书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和参考资料四大部分构成,共计五十万字。其中正文部分根据时间发展线索分为七章,对中共领导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会组织分别进行了系统探讨。

在第一章中,著者详尽考察了中共在创建时期领导的新型农会(1921年7月~1923年12月)。书中认为这种新型农会是在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农村经济凋敝、土地占有日趋集中、农村阶级构成发生显著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作者说明了中共早期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及其发展过程,并选取浙江萧山衙前农协、广东海丰赤山农协、湖南衡山岳北农协等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新型的农会组织的成立与活动情况予以重点考察。据此指出,新型农会的性质是中共领导的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团体、政权型农民自治性组织、以谋求自身利益为奋斗目标的农民组织,这也正是其与旧农会相比被称之为“新型农会”的原因所在(第1~78页)。

在第二章中,著者全面介绍了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领导的具有政权性质的农会(1924年1月~

[收稿日期] 2016-08-24

[作者简介] 孙贵林(1978—),男,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广东科技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

① 苏全有:《评〈近代中国农会研究〉》,《中国农史》2009年第1期。

1927年7月)。书中用了较大篇幅,从各地农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基本结构、主要活动、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国民革命时期农会组织的性质与特点等五个方面充分展开,阐明这一时期的农会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与国共合作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具有政权性质的农会。并指出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地区之间的较大差异,且从总体上仅局限于国民革命区域,并带有极强的政治即时性,因而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第79~287页)。

在第三章中,著者详细描画了中共领导的作为苏维埃政权基石的农会(1927年7月~1937年7月)。在国民革命失败后,农协组织被迫暂时消退,随着红色苏维埃区域的建立与发展,以“贫农团”为主体形式的农会组织旋即建立。但白色恐怖环境及孤立分散、发展不平衡的区域状态,致使贫农团组织仅设在县、区、乡和村级。贫农团开展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诸项活动。著者认为,贫农团性质是中共领导农民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群众组织,是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基础(第288~322页)。

在第四章中,著者具体阐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为政权执行机关的农会(1937年7月~1945年8月)。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抗日根据地迅速开辟与扩大,以“农救会”为主体的农会组织应运而生,同时广泛开展了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救亡、减租减息、清理旧债与抽地换约、民主建设与参政议政等活动,为争取抗战胜利、发展农业生产与合作事业等做出了重大贡献。著者认为,以“农救会”为主体的农会组织性质是中共领导的旨在团结农民抗日救国和改善生产的群众团体,是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执行机关(第323~369页)。

在第五章中,著者主要聚焦了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基层准政权的农会(1945年8月~1949年10月)。书中指出,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农民协会及贫农团等农会组织重新活跃起来,开展了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兵员动员、支援前线、发展生产等系列活动。著者明确,解放区的农民协会性质是中共领导下,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旨在消除封建压迫和谋求农民翻身解放的社会组织,是基层的准政权机关(第370~411页)。

在第六章中,著者具体解读了中共领导的建国初期行使农村基层政权职能的农会(1949年10月~1953年12月)。作者指出,该时期农会经历了初步发展、整顿调整、悄然隐退三个阶段。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经济、建设基层政权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性质是多重性的,集农民的合作组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执行机关、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农村反封建统一战线的政治同盟于一身(第412~452页)。

在第七章中,著者重点讲述了中共领导的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贫下中农协会(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书中勾勒了贫下中农协会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初步建立、蓬勃发展、沉寂与恢复、困境与撤销等四个阶段。在各级党组织的号召和领导下,贫下中农协会开展了多项活动,主要表现为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三大方面。著者指出,贫下中农协会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是中共领导的由贫农、下中农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是服务于政治运动的阶级斗争工具,并在社教运动开始后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取代了基层政权机关而成了真正的权力组织(第453~513页)。

二、研究特色

统观《中国现代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治》一书,其研究特色与成果突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该书是我国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的首部专门之作。

此前学界对中共领导的农会的研究,基本上是偏重于大革命时期,至于其他时段,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以后的研究,则明显地薄弱甚或欠缺。就研究现状来看,仅有寥寥几篇专题性的学术论文,或者在一些相关专著里有一鳞半爪的涉及,尚无一本系统研究中共

领导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会组织的学术专著面世。而且,已有的研究成果往往陷入革命史观和阶级分析的窠臼,满足于宏大叙事式的论述,多是耳熟能详、早成定谳的观点,对农会组织背后的偶然性与复杂性或一笔带过或视而不见,因此从学术层面进行触角全面、视角多维和脉络明晰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

《中国现代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治》一书出于高度的学术敏感性、问题意识与历史责任感,以基层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视角,依据时空线索对中共领导的农会组织予以全面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此前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零碎、薄弱之缺憾。该书坚持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相统一,从纵向探根扩流,分为七大时段,深入揭示出历史背后复杂关系的前后承继变迁的内在规律和主要特征;从横向由宏及微,选取历史背景、发展轨迹、基本结构、主要活动、作用局限、性质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详尽考察,逐一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农民群众心理动态等诸要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梳理了各个时期农会组织的建立、发展、式微直至退亡的历史过程,并总结出中共领导农会组织的种种经验教训。

其中,该书研究内容多系此前学界未曾关注的处女地,如苏维埃区域的贫农团、抗日根据地的农救会、解放区的农民协会、建国初期的农会和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贫下中农协会。作者对其研究对象,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加以归纳综合,从而得出了比较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历史结论,使得中国近现代农会组织的相关研究第一次实现了微观化、整体化和系统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该书的最大目的与任务所在。

其次,该书观点新颖,多处具有独到见解。

著者既重视实证研究,又颇具相当大的理论勇气。为了全面重构中国近现代农会组织的历史轨迹,作者在坚持必要的原则性立场与观点的同时不得不知难而进,对过去的一些争议、既定论断或者遗留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大胆地发表了个人独到性的看法。如浙江萧山的衙前农民运动究竟是不是中共领导的,因其主要领导者沈定一不久之后背叛革命,学界长期莫衷一是。该书认为作为中共早期的一位党员,沈氏发起、组织和领导了此次运动是客观事实,革命阵营里有人加入有人退出也是经常性现象,再说此次运动绝不是某位党员的个体行动,而是党组织领导下的集体行动,绝不能抓住个别所谓领袖人物的堕落和叛变这一点而贬损对此次运动的整体评价。著者还从中共当时的机关刊物、工作计划、报告等文件甚至国民党主办的报纸中发掘出多条资料信息,有力证明就衙前农民运动与中共的关系而言九十多年国共两党都是了然于胸的。

又如,关于一些时段农会队伍和农民运动的历史进步作用,受到过去断断续续“左”倾思想的影响,学界早已大书特书、高度肯定,对农会组织在不同时段表现出的历史局限性却一味回避。该书则贯彻正本清源、忠于史实的治学原则,对于国民革命时期存在的“痞子”行为、“斗争过火”现象以及“组织纪律涣散”等事实问题,对于苏维埃政权和抗日战争时期名称混乱、组织不力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影响有限性问题,对于解放区 and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中存在的胡乱打人杀人的极端做法,对于贫下中农协会的强烈政治色彩,以及当前农村政治管理体制中普遍存在的明显真空问题等,均是秉笔直书,并对这些错误与不足产生的原因分别作出了深刻分析。同时对国民党在早期农会组织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扶助功能,以及其执政后所领导的农会组织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都没有简单否定了事,而是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至于一些农会组织最终消退的时间,著者没有不负责任地直接接受似乎盖棺定论的观点,而是多角度、多途径地开展了仔细的查核考证,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诸如此类情形还有很多,不再一一枚举。

再次,该书论证体例新颖,论据信实充分。

该书以科研论文撰写方法为根本,采取了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交错使用的著述方法,凸显出了论

证体例上的创新性。全书大致上按照编年设计纲目,对中共领导的农会组织给予了全局性的宏观审视,全面揭示出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背景以及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种种联系。同时,对多个具体的农会组织则给予了纪事本末体式的微观阐释,即选定某一合适的历史坐标将某一持续时间长、影响比较大的农会组织的整个兴衰过程加以全景式扫描与剖析。譬如对1921年9月中共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新型农民自治性组织——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以及大革命时期粤、湘、鄂等农民运动典型省份的农协组织及其活动等,均不拘泥于时间的局限,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全书还有突出之点便是坚持史料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在极力挖掘和占有新颖、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确保研究内容的信实性。从该书绪论部分可知,著者为完成该专题研究,长时间奔赴多地,先后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以及其它有关省、市、县档案馆的有关农会案卷100余宗;收集了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室、河南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等有关图书史料300余种。著者不满足于官方的档案文献,还深入乡村的田间地头,寻找当事人口头访谈,搜集到一些乡土材料,包括公社、大队的档案或表格,以及农会干部的工作笔记等,从而获得了更加直接、真实的农村社会体验。著者甚至还想方设法寻获了台湾地区以及欧美日等国有关农会组织的档案资料。因此,该书仅随文注释就有千余条,各种统计表格近百幅,最后所列档案、史料、方志、报刊、著作、论文等分别达数十种或数百种不等。这些文献资料无疑为该书奠定了坚实的论据支撑。曾有同仁道:“凡是真正有学术影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历史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恐怕还是研究者对史料的掌握与解读。”^①撇开该书的学术价值姑且不论,其搜集、整理的大量文献资料的本身价值,也是应该被高度肯定的。

复次,该书运用了多维性、综合性的论证视角,信服力强。

该书立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更侧重于运用历史比较、政治审视、经济分析、社会考察等多维性、综合性的论证视角,对中共领导的农会组织予以纵向梳理与横向比较,从而保证了所得结论的信服力。正如前文所述,通过历史比较研究,阐明中共领导的农会组织既区别于清末民初作为统属于官府的咨询性上层社会团体的农会,也区别于民国中后期国民党领导的作为保甲制度落实机制和乡村自治补充形式的农会。中共领导的农会组织的职能和任务与时俱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种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旨在消灭封建制度、谋求自身解放和民族独立、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农民团体。……又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破坏者’和现代新型基层政权机关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创造者’”;^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则“分别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由贫农、下中农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均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中扮演了‘建设者’的重要角色”。^③另外,又从政治学的视角,务实地分析了中共领导的农会组织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最大政治中所处的地位与主要活动,以及乡村政治联盟(组织)的特点及其天然的缺陷;从经济学的视角,充分解析了农会组织兴起的经济背景、经费收支状况,以及在发展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中的作用;从社会学的视角,横断面地剖析了社会的大环境、中环境和微环境,以及农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及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等等。

最后,该书的社会影响和应用价值不可小觑。

该书在知古鉴今、以史资政的致用性层面也作出了前瞻性的思考。著者指出,纵观中共领导的农

① 常利兵:《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与展望——基于资料、视角与写法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② 李永芳,等:《中国现代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治》,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14页。

③ 李永芳,等:《中国现代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治》,第520页。

会组织的发展轨迹,基于种种复杂交织的原因最终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农会组织,而是固化为一种政府或政党的政治工具,相当长时间里表现为体制外政治力量与体制内统治力量相互博弈的革命手段。于是,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旦谈起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就认为其具有破坏社会稳定的潜在可能。当前农会组织的重建既没法理性依据,也没制度性架构的现实似乎就是对此的反映与证明。事实上,参照中外的历史与现实,农会组织并非势必成为一种专门对抗政府的革命团体,在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和更多的实践中,农会就是经济上发展农业生产的公益性社团组织,政治上整合农民利益、与政府协商沟通的政治参与组织。即使就当前中国农民的主观愿望而言,其经济利益诉求也远高于政治利益诉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实现农村治理转型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推动农民再组织化或农民自己再组织化,建构集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于一体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使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依附型向契约型转变是其中应有之义。^①该书对近现代中国农会组织的事实性缺失作了历史性的审视,并就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的原则和宗旨提出了意见与建议。这些都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共创建领导农会组织工作的历史经验,对于从事农村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对于国家有关领导决策部门,如何更好地做好“三农”工作,客观认识目前理论界关于是否恢复和重建农会组织的热点问题,把握好现代意义上农会组织的民间性、自主性、自愿性和法制性的方针和原则,以便进一步加快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步伐,推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落实村民自治与农村政治体制改革,都有着更为直接而现实的指导作用。

三、尚存不足

正如作者在该书绪论中所讲到的,由于中共领导的农会组织时间跨度长达 60 余年,且名称几变,形态有异;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农会组织分布零散广泛,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再加上时间紧迫、经费有限等客观原因,故该书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未能详尽地将全国各个地区的档案、史料等搜集到手,即便是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也因记录者的身份、文化水平、认识能力、政治立场等主观因素而与真实的历史有着不同程度上的出入,这就必然会影响到某些结论的普遍性和公信力。因此,如何进一步充分挖掘与甄别史料、选取典型区域,分别对中共领导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农会组织加以比较研究,并据此揭示出带有普遍规律性的历史结论,这是该书在今后修订再版时需要继续努力加强的问题。另外,农会组织与其某种程度的继承者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前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在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方面承担的职能与实际运行中的缺陷;同时,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力量从农村基层的撤退,传统宗族势力再度活跃,以及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而给基层社会权力变迁带来的影响,这些方面也是今后该专题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体而言,该书在研究内容方面具有首创性,在体系构建方面具有系统性,在角度挖掘方面具有多维性,在分析论证方面具有客观性。如细读全书,可以对中共领导的农会组织与基层社会权力结构变迁进程及其相关研究的累进深入轨迹获得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识,这样的研究不仅在内容及其最终成果上其学术贡献自然不能低估,相信会引起同仁们的共鸣,推动学界对该专题研究的深入进行,而且在态度和方法上,著者勤奋刻苦的治学态度和严谨客观的科研行为本身,对于后来者都是一种很好的参照与启示。简言之,该书体现了不一般的研究主题、问题意识与探索路径的有机统一,以鉴史资政、研以致用的责任感开创了历史问题研究的新境界,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① 李永芳,等:《中国现代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治》,第 521~528 页。